援藏三年 情系一生

■本报记者 须双双

2016年6月22日，9名浦东援藏干部——孙嘉丰、江臻宇、李荣、张裔、于春峰、刘小松、孟岩、刘生金、朱华忠，结束3年的援藏生活，从千里之外的江孜回到了上海。

三年前的6月，作为浦东第一批包县制援藏体制下的援藏工作团队，他们惜别亲人，远赴江孜，并在那里为雪域高原注入现代化发展的活力。

根据一份江孜小组所作的情况总结报告，第七批援藏项目分为新农村建设、社会事业、产业发展、人力资源开发及其他等四大类，合计投入援藏资金约1.6亿元。

其中，涵盖了农村示范点建设、农村饮水解困、城市环境整治、江孜县人民医院设施设备改造、老年福利院建设、城区有线电视数字化配套、《江孜印迹》大型实景剧编排、现代农业园区建设、人才培训、基层党建示范基地建设等共36个项目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第七批援藏干部江孜小组成员平均年龄42岁，全部是正科级以上干部，其中有3名博士。针对“一区对一县”的包县制的援藏模式，9人分别来自区府办、环保局、农委等部门单位，到西藏后分管各自原本对口的工作，术业专攻。

“三年里，最大的感受，是我们为江孜的进一步发展打了一点基础。”担任江孜县县委书记的孙嘉丰说。

江孜的“基础”正越来越牢固。路宽了，城市干净了；农村里的藏民喝上了干净的水；重建的藏改乡小学改善了孩子们的学习环境；改建后的江孜县人民医院成为全区第一个县级层面二级甲等医院……

而这些改变的背后，离不开浦东援藏干部的付出。

2013年的3月，为了给江孜海拔最高、条件最苦的一个村落寻找水源，担任江孜县副县长、援建项目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李荣，作为水利工程学博士，和县水利局的工作人员翻越一座海拔5700米的山，历经缺氧和高寒的艰辛，最终在雪山的另一头找到了水源。

援藏干部朱华忠兼任县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和县人民医院院长，曾用2个月的时间，行车700公里，走访19个乡镇的卫生院和卫生。2014年起，在他的牵线下，先后有10多个来自农牧区的先天性髋关节脱位患儿，被送往上海免费接受髋关节再造手术。

进藏3年，浦东的援藏干部为江孜县带去的不止是一个个项目，更重要的还有自我造血的能力，和两地间的情谊。

2014年的8月16日，大型歌舞实景剧《江孜印迹》首演。这是由浦东援藏项目出资1800余万元打造的江孜文化旅游产品，也是西藏唯一的县级大型实景剧演出，由近300名当地农牧民担任演员，目的就是为了留住游客，同时实现本地藏民的增收。2013年的一项数据显示，江孜的旅游人次为13万人，但只有3人留下过夜。有了《江孜印迹》以后，游客不再只是“路过”，而藏族大爷“拉头牦牛出来转一圈就有工资了”。

除了旅游业，在红河谷现代农业示范区里，标准化的日光温室、西藏自治区内最先进的机械化育苗中心等，从无到有。30多种蔬果和现代种植技术被“引进来”，江孜种植的高原灵芝和各种珍稀菌菇“走”出高原，带来财富。

6月21日那天，自发来送行的当地干部站满了县政府的大院，紧紧的拥抱，洁白的哈达，见证了不舍。3年的共事让双方结下了深切的情谊。

谈起3年中最大的遗憾，是援藏干部们对家人的亏欠。

在江孜县担任住建局副局长的孟岩，爱人待产，直到推进产房的一刻，他才匆匆打“飞的”赶到；援藏干部每年有休假时间，但作为领队，孙嘉丰不得不长期坚守岗位，甚至没见上奶奶最后一面；任江孜县发改委副主任的刘小松，隐忍忠孝两难全的悲痛，错过了与老父亲最后的告别。

3年的高原生活，对援藏干部的身体造成不可逆的影响。因为长期缺氧，血液回流给心脏造成强烈的负担。

瘦了，黑了，头发少了，心脏大了。

尽管如此，“不后悔”却是浦东援藏干部们共同的心声。

2016年3月，江孜小组在宗山广场集体合影。 □援藏干部江孜小组/供图

援藏，谱写人生最美丽的画卷

孙嘉丰
上海市第七批援藏干部江孜小组组长，援藏期间担任江孜县县委书记

三年援藏，于我而言，既是人生历练，更是党性的锤炼；既是责任担当，更是境界提升。

三年前，我们选择了远方，也迈开了走向远方的脚步。

2013年6月16日，我受组织选派离沪赴藏。这一刻起，我明白自己肩上的新担子：从此，我将带领我们第七批援藏干部江孜小组的成员们，用三年的时间，回答好“进藏为什么？在藏干什么？离藏留什么？”这一命题，诠释好上海干部、浦东干部的形象与担当。

身处江孜，现实让我们吃了一惊：全县仅有人口7万，年财政收入更只有区区1882万元。更现实的是，高原反应还是如期而至。到江孜的头一个月，我们就在高原反应与高强度工作交替中度过，跑基层，访群众，听汇报，理思路，跑遍了全县19个乡镇和部分村户，晒黑了脸，记满了流水账，摸清了“家底”。最初，比工作更难更艰苦的，是要克服心理上的负面情绪，9名男儿，哪个不是家里的“顶梁柱”?！自此远别4400多公里，对家人的牵挂、担心，甚至愧疚，时不时会涌上心头。有些同志高反严重，甚至都去住院挂盐水，但是他们怕家里人担心，都瞒着家里，打电话时还强撑着让声音显得轻松点。这三年，有同志的亲人过世、有同志亲人大病动手术，也有同志孩子出生，更有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和困难，但是同志们的家属都默默地克服着，互相关心、鼓励、帮助着走了过来，为在藏工作的丈夫解除后顾之忧。

再度回味那段日子，只想表达：三年进藏“江孜有我”的支撑，正是我们的组织、我们的爱人“家里有我”的默默关心与无私奉献。

三年中，所做一切，都为了“洁白的哈达”与“那一口酥油茶”。

三年里，我们收获最多的就是哈达，这是一份敬意，更是一份信任。三年里，第七组的全体同志都把自己当作江孜一员，大家都说：“只有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，把这里的人民当成自己的亲人，对这里的一切投入真挚的感情，我们的工作才能有依有靠、有所作为”。我们每个同志都联系了2–3户困难户，还资助结对了江孜孤儿院。在江孜三年，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陌生过，走村入户更是深深感受到当地农牧民的热情，把你当亲人一样的感觉是最好礼遇。

刚到江孜，时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、日喀则地委书记丹增朗杰也到江孜调研，指出江孜这几年发展有所滞后，必须要真抓实干，尽快出成绩。我们与县里达成共识，提出了现代农业强县、教育科技兴县、文化旅游富县的发展思路。当我们把调研成果报送区委、区府时，晓明书记作了专题批示，希望江孜小组会同当地同志一起认真谋划好援建项目，造福江孜人民，为上海争光，为浦东争气。

三年中，很欣慰我们九名同志没有辜负当地干部群众的期望，圆满了完成了各项援藏任务。今年江孜第二中学的中考成绩再传捷报，上内地班的学生为132人，而2013年时只有28人。我们打造了西藏第一个县级二甲医院，备受各方争议的医疗水平和服务态度有了极大的改观。在援藏项目上我们着重突出文化旅游和现代农业这两个产业项目，目前上演的《江孜印迹》实景剧有正式演员和群众演员近300人，除60名民间艺术团演员，其他都是来自于江孜19个乡镇的普通群众，这样就意味着有200个家庭会因实景剧的上演而收益。2014年9月红河谷现代农业示范区初步建成后，次年向9个乡镇600多户农民提供100多万株蔬菜种苗，人均年增收约800元。

数字，相对生硬；但情感，质朴真诚。援藏三年，总有朋友问起“援藏怎么样”？我总是真切地说，援藏工作很有必要，因为这不是简单的给西藏支援点钱和项目，而是真正促进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。也正是如此，援藏三年，我们工作目的越来越纯粹，就是为了回馈当地农牧民、对得起他们敬给我们的那么多哈达与酥油茶。

三年后，最想表达的是：援藏无悔。

3年，在距离浦东4400多公里、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，我们9名同志坚守、耕耘了1095天。今天，回到浦东，站在这里，很想对大家说的是：援藏是一场团体赛，感谢后方的支持。三年里，我们每次从江孜回来，到区委、区政府和各部门、各单位走访，申请支持，大家都是那么慷慨。也正是有了各方面的鼎力支持，我们才能建成红河谷现代农业示范区，有了西藏第一个县级层面的实景剧——《江孜印迹》，有了覆盖县城和周边乡镇2500户居民的数字电视工程，有了完整展示西藏抗英历史的抗英纪念馆……

援藏，也是一场接力赛。“每一批援藏的人，终究是要走的”，三年时间很短，我们要为，能为当地做的事情还有很多，这是一项“一棒接一棒”的事业，是一项“只有开始，没有结束”的事业。现在第八批援藏干部也已经到位。站在黄浦江畔，看着这美轮美奂的滨江夜景，我们还常常想起雪域高原的蓝天白云、五彩经幡，耳边似乎萦绕着天籁之音。我想，这份担当成就的人生画卷，这份情感缔结的高原眷恋，这份使命锻造的坚忍力量，已经渗入我们的骨髓，支撑我们走得更远！援藏，无悔的选择、无悔的人生！

援藏，家国情怀中无悔的抉择

刘小松
援藏期间担任江孜县发改委副主任

三年援藏路，有苦有乐，有悲有喜。

我的老家在江西一个小县城，年迈的父母亲在那里生活。2013年6月出发前，老父亲已经83岁高龄，中风也已多年，生活全靠母亲照料。我放心不下，专程回老家探望，父亲紧紧握住我的手说：“小松，不要惦记家里，安心工作！”

2015年的春节回家探亲，父亲身体不是很好，精神也大不如前，我想留下来多陪他几天，可是善解人意的父亲多次敦促我早点出发。刚到金华，收到父亲病危的消息，我连忙掉转车头一路狂飙，还是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！父亲丧事尚未完全处理完毕，过完“头七”，母亲怕耽误我工作，催促我尽快返藏。那个时候，多想把她接到上海好好陪伴她！

但是，母亲说不习惯大城市的生活，我知道她是不想给我添麻烦，因为我的儿子即将升入初二，学习压力比较大，又正处于叛逆期，我的妻子在外企任职，工作强度很大，一个人又当妈来又当爸，着实不易！2015年6月，儿子临近中考，有一次，大概是备考压力大，儿子在视频时哭着对我喊：“爸爸是逃兵，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却不在，我恨你！”那一刻，我五味杂陈，无言以对，只能彷徨面壁。

其实，我们团队的9位同志，哪个家里不是如此！这个年纪，都是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全家都指望着我们。选择援藏，我们不是没有顾虑，不是没有担心，不是没有牵挂。但是，既然选择援藏，就必须有所付出，有所牺牲，没有国，哪有家！

三年前，从上海启程，飞向被誉为“世界屋脊”的时候，还没欣赏到高原的美丽风光，却先领略了它的狰狞恐怖；在我们从拉萨机场赶往日喀则的路上，中途下车休息时，我突然呼吸困难，双脚仿佛踩在棉花上，跟着眼前一黑，便失去了知觉。醒过来的时候，我躺在座椅上，鼻孔里插着输氧管，周围是随队领导和援藏兄弟关切的脸。

随后的日子，虽然头痛欲裂、腹泻呕吐、胸闷气短、整宿整宿的失眠，但我还是顽强地挺了过来。既然选择来援藏，就不是来享福的，而是来干事的，是来磨炼自己的，把援藏作为一种修行，一份责任，一种使命。抵达江孜后，稍做休整，我和项目组的另外两位援藏同志就开始了实地调研。记得有一次去海拔5100米的龙马乡卓庆村，那是一条刚修的简易盘山土路，越走越险，一侧是嶙峋的岩石高悬头顶，似乎时刻要掉下来；一侧是深不见底的山谷，开到半山腰，汽车抛锚了。大家只能下车徒步，稀薄的氧气让我们三步一喘，还得提防不时滚落的碎石，爬了差不多1公里到达山顶时，我们再也坚持不住了，顾不上遍地的牦牛粪，扑通坐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喘气。

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仍然用20余天走遍了全县所有乡镇。有了第一手的调研资料，还需要尽快形成调研报告，明确援藏工作思路和项目。因为时间不等人，我鼻子里塞着氧气管，写到凌晨两三点是常事。经过十多个昼夜的撰写、修改及广泛听取意见，援藏项目的调研报告如期完成，为江孜县第七批援藏工作确定总体思路和目标打下了基础。

经过3年的努力，江孜的面貌改变了许多；一个个援藏项目拔地而起，尤其是看到长年喝不到干净水的农牧民，终于喝上了清洌的井水；看到孩子们搬进了宽敞明亮的现代化教室；看到游客们在夜晚宗山城堡的灯光照耀下，和藏族百姓一起在修葺一新的宗山广场跳起欢快的“锅庄舞”；看到观众们观看《江孜印迹》演出时的震撼鼓舞……《新闻联播》和《焦点访谈》栏目也先后报道过我们取得的成果，我们9名浦东干部组成的江孜援藏小组也获得了2015年上海市“模范集体”光荣称号，这是上海市对口支援20年来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援藏工作组。

西藏归来，我依然经常梦见江孜，梦见那一面面五星红旗，梦见那一张张藏族同胞的笑脸。我想，在我的生命里，将永远烙上雪域高原的印记，那是我人生中最为精彩，最为难忘，最可宝贵的一份财富，也是永远激励我勇往前行、铭记终生的家国梦！

用爱的教育，撑起雪域高原的暖廊

刘生金
援藏期间担任江孜县教育局局长助理，江孜二中党支部书记、副校长

援藏很艰苦，但是很值得，因为我用共产党员和人民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为边疆教育事业做出了一点贡献。

在海拔近4100米的江孜，七月盛夏着棉衣，三更失眠倚寒窗，是我们生活的常态。高原上气候干燥，导致鼻腔黏膜堵塞，诱发慢性鼻炎，对呼吸和睡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每天早上起床，鼻子里都黏着厚厚的血块。为此，我的床头常放着两杯水，一杯用来喝，另一杯则在呼吸不通畅被憋醒后，用来滋润鼻腔。

尽管身处这样的环境，组织上交给我们的重任、当地藏民对我们的期待，让我们咬紧牙关，挺了下来。

还记得刚到江孜的时候去基层调研。我和孙书记从县城出发，绕了100多公里的盘山路，去加克西乡查看情况。这个乡平均海拔4700米，只有三个自然村，总人口不到200人，自然条件极其恶劣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还没走近学校，就远远听到了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。更让我难忘的，是那些孩子的模样，零下30多度的严寒，让他们的小脸重上全是皲裂的痕迹，握着课本的小手冻得通红，手背上厚厚的一层灰，看不见原本的肤色。

回到县城，我把这情况跟同志们说了。于是，一份投入20多万元的改造计划书就出炉了。没多久，新的暖廊建成了，孩子们再也不必忍受严寒，可以温暖安心地休息、玩耍了。2014年，在加克西乡小学放事的影响下，我们牵线搭桥，由浦东团区委和区教育局启动了“暖心接力”计划，不到两个月时间，为7300多名江孜县的所有小学生，募集到了过冬衣物。第二年，暖心接力的计划依然在持续。

孩子们特别懂得感恩。以后我每次去看望他们，远远的，不用老师教，孩子们主动给我敬礼；上海老师好！每当这时，我总是眼含热泪；付出的再多，也值了。

陶行知先生曾说：“爱是一种伟大的力量，没有爱就没有教育。”三年来我不断实践“爱的教育”，努力用关爱去点亮一个又一个农牧民家庭新的希望。

在援藏项目推进中，我们筹建了江孜县教师培训中心，按照互联网+教育的思路搭建了远程网络培训平台，解决了当地1000多名教师的在职培训问题。

三年里，我只要一有空，就会去教室里听课，总共听了三百多节课，江孜二中的师生们送给我一个绰号，叫“听课校长”。在听课中，江孜二中的教研氛围也越来越浓厚，老师们上课越来越认真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学校的中考成绩进步明显，连续三年在日喀则地区22所普通中学中名列第一，内地西藏班的上线率不断刷新纪录。

2015年，我结对帮扶的一个学生扎西次仁被常州一所重点高中录取，她的父母特意从100多公里外赶着马车，带着奶渣和牛肉干来给我献哈达，他们紧紧握住我的手，眼含热泪用藏语说：拉脱且，感谢！

看着欢笑的藏娃，我难免会想起家中年幼的女儿。

一人援藏，全家奉献。作为儿子，不能对父母尽孝；作为丈夫，不能对妻子尽心；作为父亲，不能对儿女尽责。除了身体上的考验，援藏后，我们个个变成了“单身汉”，守着一盏孤灯，在漫漫长夜中，辗转反侧。

我的爱人是一名中学老师，而且担任班主任，工作负荷较重。三年里，我的缺席让她几乎成了“单亲妈妈”，家庭的重担全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。年幼的女儿，因为爸爸不在家，变得胆小害怕，没有安全感。我记得半年后从西藏回来时，女儿陌生地看着我，我想去抱她，她却躲开了，那时别提我有多失落了！女儿虽然年幼，但自她来江孜参观了当地的学校，并看望了孤儿院的孩子后，她认可了爸爸的付出，回到上海后，还用压岁钱给孤儿院的结对小朋友买了玩具寄过去，这让我很欣慰。

在青海高原长大的我，对西藏总有一份别样的情愫。而如今，江孜，又在我记忆的长河中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我感谢命运的眷顾，我在攻坚克难中感悟：放飞人生的梦想，就应当在艰难的逆风中飞扬！

发展中的江孜县城 □援藏干部江孜小组/供图

浦东援藏干部解决了不少村庄的饮水问题。 □援藏干部江孜小组/供图

格桑花开，有我们贡献的芬芳

季淑萍
上海市第七批援藏干部、江孜县委常委、副县长李荣的爱人

我是浦东妇幼保健院高危新生儿室的一名护士。我清晰地记得，李荣第一次从西藏回来时的情景。那是在出发半年后，援藏干部回上海休检。那天我在医院特别忙请不出假，李荣的姐夫去机场接他回家，路过医院来拿家里的钥匙。在医院楼下，我看见车里走出一个上了年纪的人，瘦瘦的，皮肤很黑，走路还有些摇摇晃晃。走近一看，竟然就是李荣。才半年啊。我忍不住哭了。

回想起上海第七批援藏干部出发的日子，2013年6月16日。那天，我，还有送行队伍中很多依依不舍的家人，有了一个新的身份：援藏干部家属，媒体称我们为“援内助”。

三年里，援藏干部在千里之外的高原上挥斥方遒，建功立业，而我们这些“援内助”们，则在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中，与相思同枕、和牵挂共眠。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一听到和江孜、西藏沾边的字眼，心跳总会不自觉地加速。

第七批援藏干部刚进藏的时候，传回了很多人高原反应的消息，李荣却在电话中告诉我，他身体好。直到后来，我们家属间一交流才知道，那时候，明明他们每个人都在医院打点滴，却都对家人“报喜不报忧”。援藏干部的坚忍和付出，作为家属，我们看在眼中，疼在心里。

回家以后，李荣总是抢着做家务。我知道，他是心里对这个小家有愧疚。就在李荣出发前，我体检的时候查出了些状况，当时说是恶性肿瘤的几率很高。李荣陪着我跑了很多家医院复诊。一天，有个医生对我说：“没有腹水，还有治疗的余地。”当时脑子里嗡地一下，就什么也听不见了。我是学医的，“没有腹水”背后的含义令人害怕。

那天李荣挣着我走出医院，他对我说，如果能顺利手术，那么再给他三年的时间。当时，我特别不能理解，委屈的眼泪夺眶而出。6月4日，我在医院做了手术，患有糖尿病的妈妈从老家赶来照顾我，所幸活检结果是虚惊一场。两个星期以后，李荣返藏时我从病床上爬起来为他送别，从医院赶去送行的时候，我又不争气地哭了，要说不委屈，那是假话。

李荣走了以后，照顾家庭的责任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。我知道，李荣在江孜工作不易。所以，家里的事，我全都一个人扛下来了。我知道，江孜是李荣的第二故乡，藏族同胞同样是他的亲人。照顾好上海后方，这是对他最大支持！

独自承受这种艰辛的，不止我一人。援藏干部刘生金的爱人是中学班主任，女儿生病了，她只能在医院里一边陪护、一边给学生改作业。援藏干部走的时候，孟岩的爱人已经怀孕，直到推进产房，丈夫才坐着飞机匆匆回到上海。

三年里，援内助们也结成了深厚的友谊，相互鼓励，相互帮助。平日里，接到与亲人相关的消息，大家乐于分享。

2014年8月，我第一次入藏探亲。因为缺氧，整个人都像飘着似的，夜里睡不好，去食堂吃饭，菜色很单一。这样艰苦的环境令人有些出乎意料。很难想象，援藏干部要克服这么多身体上的煎熬工作三年。那一刻，我曾经的埋怨全都消散了。

三年前，李荣入藏，我曾想，他能实现心中的梦吗？三年后，我的心中有了明确的答案。第二次去入藏探亲，我看到，宽阔的英雄北路上人群熙熙攘攘，街道宽阔整洁。藏族孩子坐进了明亮而温暖的学堂。当地农牧民热情地邀请我们做客，拿出最好的青稞酒和酥油茶，虽然听不懂他们的语言，但是从他们的眼神中，我感受到了信赖和感激。

这些，都是援藏干部燃烧三年的青春与汗水，交出的一张雪域答卷。我相信，他们付出的努力，没有辜负历届援藏干部打下的根基，也将成为下一批援藏干部继续攀登的阶梯。

感恩我的“三不”兄弟们

格桑达瓦
西藏江孜县旅游局副局长

三年相处，上海市第七批援藏干部江孜小组兄弟们的硬气和韧性感染了我。在我心中，他们是“不怕苦，不畏难，不怕烦”的“三不”兄弟，我敬他们是真汉子。

第一次相会，是在县政府的大院，一排高大友善的兄弟们就在我眼前，仿佛巍峨的乃欲康桑雪山。我为他们献上了哈达，却发现刚毅的面容下，每个人都已经脸色发青、嘴唇发紫。我知道，高原反应已经开始考验他们的身体。寒暄中，大家都劝慰他们先适应几天，再动身调研。可令我们吃惊的是，他们简单地安顿了一下，第一时间就开始了工作。

循着日喀则市委和江孜县委确定的“现代农业立县、科技教育兴县、文化旅游富县”总体思路，嘉丰书记带着兄弟们多次来到大山深处的偏远农村调研，与农牧民吃住在一起。驻村的时候，大家跟农牧民一待就是一个星期，上牧场、下田地，切身了解需要解决的问题。偏远的农村，牧民们家家都用晒干的牛粪烧锅取暖。调研时，大家饿了在农民家中搭个伙，连蒸出来的馒头都带着牛粪味。我们都有些过意不去，可浦东小组的同志们却坚持下来了。临走的时候，还把清洁用水、整修道路等群众急切的需求带了回去。在浦东小组的不懈努力下，3年时间内，县里立项投入1200多万元，解决了18个山沟村5000多名农牧民的吃用水难题。

如何挖掘旅游文化资源，让贫瘠的土地焕发出活力光彩，浦东小组的干部们动足了脑筋。紫金乡，江孜县有名的贫困乡，全乡291名农民，青壮年外出打工，空心化严重，找不到脱贫致富的出路。经过详细调研，浦东小组的干部们了解到，紫金乡辖区的紫金山上存有藏王官遗址，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保护价值，周围又是风景秀丽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。

从2014年1月起，“紫金湿地公园及藏王官遗址景区”立项方案完成了，县里财政配套资金启动了，浦东小组的干部们还从北京请来了规划专家整体论证。随着一个以紫金湿地、紫金寺遗址、藏王官遗址为核心的文化旅游景区落成，周边的帕拉庄园后花园和宗山古堡也得到了复原维修，乡民们就近在景区的住宿、餐饮和向导等岗位上找到了合适的工作。今年1月，藏王官遗址景区二期已经立项。作为江孜县的首个国家4A级景区，遗址公园成为了江孜文化旅游和农民增收的一张新名片。

我曾问过臻宇同志，为什么援藏干部工作起来都这么急？他说，浦东的精神就是“只争朝夕”，大家急的是，短短三年，怎么完成浦东区委、区政府委派的任务？怎么实现江孜老百姓的期许？

江孜第一个实景剧《江孜印迹》，从2013年8月立项，到2014年4月排练，再到8月15日江孜抗英110周年纪念时公演，时间之紧前所未见。冲刺阶段，参演的农牧民天天加班排练，有了罢演情绪。张裔主任一行连夜做演员的思想工作，终于化解了演出团队的情绪。首演中，原生态的文化盛宴取得了巨大成功，一批江孜籍老干部、当地农牧民看得热泪盈眶，演员们也含着泪表演。两年多来，300多场的精彩呈现，给农牧民们带来实在的好处，也让本地群众深入认识了自己的家乡，还带动了民族手工业、高原特色农牧产品的销售，文化旅游业已逐渐成为江孜富民强县的主导产业。

三年结束了。浦东干部们“不怕苦，不畏难，不怕烦”的精神，我们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他们带来了项目，提高了百姓收入，也给我们带来了观念的更新、思想的触动。他们离开的那天，我们再次献上一条哈达。圣洁的白色，饱含着雪域高原1000多个日夜的感激和深情。